

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机制探究

——以汉语“很+N”构式为例

刘梅丽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服务与管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4)

摘要:本文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构式语法和关联理论,以“很+N”构式为例,分析语法转喻解读所涉及的认知和语用因素,并提出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研究发现,首先,语言交际的关联原则驱使受喻者发挥认知主体性寻求词汇义与构式义相容的解读方式,从而导致构式义压制词汇义,然后,转喻认知机制的作用使受喻者对语法构式里的词汇概念进行转喻推理。在转喻推理过程中,认知语境的制约使受喻者从与本体概念语义具有邻近关系的多个概念语义中识别出转喻喻体,从而成功解读语法转喻。此间,关联是前提,受喻者的认知主体性是主导因素,构式语义压制是转喻推理的诱因,语境制约是转喻推理的必要条件。语法转喻的解读是受喻者发挥认知主体性对意义的动态建构过程,是诸种认知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语法转喻;认知语用机制;语义压制;主体性;“很+N”构式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8)01-0030-05

Abstract: Based on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y,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relevance theory, this paper, taking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Hen + N*”, explores the cognitive pragmatic mechanism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argues for the joint work of conceptual metonymy and relevance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and puts forward a cognitive pragmatic model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s constrained by relevance theory, the interpreter's subjectivity, semantic coercion and contex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when the interpreter discovers that the lexical meaning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driven by the expecta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in communication, he will tak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to seek a way to make the two meanings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which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coercing the lexical meaning. Then, the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prompts the interpreter to undertake metonymic reasoning, in which contextual constraints facilitate the interpret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rget concept from many adjacent concep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which involv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constraints of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factors.

Key words: grammatical metonymy; cognitive pragmatic mechanism; semantic coercion; subjectivity; “*Hen + N*” construction

- [11]何建敏,于建平.英语学术论文引言部分的经验功能分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2006(3):104-108.
- [12]蒋婷,徐娟.英文法律类论文中引言的体裁研究——以英汉对比为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3(2):203-208.
- [13]刘润清.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 [14]牛桂玲.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学术期刊论文摘要汉英翻译显化特点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2):112-116.
- [15]王克非等.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16]王晓军.复杂文体的语类分析视角初探[J].英语研究,2008(2):32-35.
- [17]徐有志,郭丽辉,徐涛.学术论文体裁教学不可或缺——英语专

业硕士学位论文引言写作情况调查[J].中国外语,2007(4):47-51,60.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之子课题“中国外交话语多模态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3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BYY006)和河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机器辅助外事翻译模型及语料库建设”(项目编号:132102210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牛桂玲,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孙毅

1. 引言

语法转喻指语法结构中所体现的概念转喻,它是人类的转喻思维方式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语法转喻对语法结构中的词类分布和句法形态等方面产生影响,因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语法转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发展,研究成果不断增加(Kövecses & Radden 1998; Dirven 1999; Ruize de Mendoza & Otal 2002; Brdar 2007; Ruize de Mendoza & Pe? a 2008; Panther & Thornburg 1999; Panther *et al.* 2009; Littlemore 2015; 李勇忠 2005; 黄洁 2009; 杨成虎 2010; 吴淑琼 2013; 魏在江 2015)。

然而,现有研究对语法转喻运作机制的探讨依然存在缺陷。首先,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本体和喻体概念语义的通达过程,而对通达的选择过程关注不够,即认知主体怎样从与本体具有邻近性的多个概念语义中选择喻体的概念语义,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虽有论及,但仍然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如吴淑琼(2013:125)承袭Panther(2005:357)提出的转喻“心理可及观”,认为语法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式中源概念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的认知参照点现象。但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式中,与源概念邻近的概念语义有多个,为什么源概念只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可及通道依然未知。为此,程琪龙(2011:3)提出了“选择激活说”。他指出,在喻体的选择激活过程中,以经验知识为内容的概念框架在语言输入的刺激下,处于半激活状态,因而具有操作整体效应,从而为转喻推理提供基础。在概念框架整体效应的作用下,本体最终通达并激活喻体。但是,对于本体究竟是怎样选择激活喻体的,程文依然语焉不详。此外,李文浩、齐沪扬(2012:25)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扩散激活模型”来解释转喻的认知机制,认为转喻喻体节点的激活是以概念之间的邻近性为基础,依赖认知主体从转喻本体节点到喻体节点的心理可及性实现的,并且指出这二者之间的心理可及性是最高的,所以喻体节点能被激活。但是,为什么本体节点到喻体节点的心理可及性最高?他们只从语义的角度并结合百科知识进行解释,未曾考虑语用因素。虽然该文也指出转喻喻体的激活“关键在于该转喻所在的句子及其相关的语境”,但是对于“相关的语境”怎样具体发挥作用却未曾论及。曹燕黎(2015:274)也指出,学界现有转喻研究没能联系转喻解读的各类限制条件对其推理的具体解读过程进行描述,“不能很好地解释听话人如何从认知语境的一系列相关假设中选择合适的解读候选项”。其次,现有研究对语法转喻解读过程中,转喻推理动因的解释尚存精进之处。黄洁(2009:9)认为语义压制是语法转喻构式转喻推理的动因。吴淑琼(2013:126)也指出语法结构会促使或限制转喻操作过程,但是,这其中除了语义方面的制约还有语用原则的制约。我们认为,语法转喻

的解读过程不仅仅是认知操作过程,而且还是语用原则和语境因素作用建构意义的过程。束定芳(2017:78)认为,国内的隐喻和转喻研究在关注国外动态、引进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汉语隐喻转喻的系统性,研究中国文化中概念隐喻的特点以及对中国人思维习惯和方式的影响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构式语法和关联理论,以汉语“很+N”构式为例,探析语法转喻的解读机制,并试图建立其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

2. 语法转喻的解读机制

语法转喻的解读是语言交际的关联原则、认知主体的主体性、构式语义压制和认知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节将以汉语“很+N”构式为例,首先讨论关联原则、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和构式压制在语法转喻解读过程中的作用,然后分析在语法转喻喻体的确认过程中认知语境的制约作用。

2.1 关联原则、构式压制与语法转喻解读

汉语“很+X”构式中,“很”是程度副词,其后一般接形容词或动词,如“很好、很想”。据《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 2007:266),“很”用于动词前,仅限于部分表示“情绪、态度、理解、评价、状态”的动词。而这类动词所陈述的行为都有程度之别,即其动词语义存在量级特征,如“非常想、很想、想、有点想、不想”,“很想”是其中的一个量级。可见,“很”无论是用在形容词前,还是动词前,都表示“程度高”。因此,“很+N”的构式义是“某种属性(性状)或动作行为达到很高的程度”。

“很+N”构式中,名词“N”违背了上述“很+X”构式对“X”的词性要求(即形容词或动词),这种对常规的偏离是人类的转喻思维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前人相关研究(张辉、卢卫中 2010:95;黄洁 2009:10)也指出,“很+N”构式里名词存在语法转喻,即用类属来指代属性。例如:

(1)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英国人决不惊慌,至多耸耸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CCL)

名词“绅士”指称有礼貌、有风度、举止文雅的人。而在例(1)中,副词“很”与“绅士”搭配,名词“绅士”便不再是指称“绅士”这一类人的类属概念,而是突显了这一类人所具有的典型特性——有礼貌、有风度、文雅的。

下面我们受喻者^①解读的角度分析“很+N”构式解读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和语用因素。

现代汉语里,副词一般不能修饰名词。当受喻者解读“很+N”构式时,发现名词“N”的词性和指称意义与“很+X”构式对“X”的要求冲突(“X”应为具有量级特征的形容词或动词),此时,构式会压制词汇义而对语法结构的意义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当受喻者意识到词汇义与构式不相容时,会通过主观努力寻求某种相容的语

义解读方式,这即体现了关联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每一个明示的言语交际行为,交际者都应该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Sperber & Wilson 2001:158)。认知主体所做的这种主观努力是其认知主体性^②的体现。言语交际的最佳关联期待指引着受喻者积极发挥其主体性去做认知推理,透过说话人明示的言语,识别其真正的交际意图。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的明示和听话人的推理是交际得以成功的两个关键方面(Sperber & Wilson 2001:176)。正是言语交际的关联原则和受喻者的认知主体性,使得构式义压制词汇义得以实现,受喻者主动按照与构式义一致的方向寻求对词汇义的解读。就“很+N”构式而言,受喻者会努力尝试按照“很+X”构式里“X”是形容词时的属性意义或者是动词时的动作行为意义来解读名词“N”。由于名词指称事物,而事物具有多种属性特征,事物与其属性存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用整体指代部分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刘梅丽、王文斌 2016:52)。因而,名词“N”所指称的事物能很快激活^③与之相关的属性特征,受喻者能快速识别“很+N”构式里存在概念转喻,即名词“N”转指其具有的某种属性。此过程体现了人类转喻认知机制的作用。

就例(1)中构式“很绅士”而言,受喻者首先发现名词“绅士”的指称意义与“很+X”构式对“X”的词性和意义要求不相容:如上所述,“很+X”构式要求“X”是表属性的形容词或具有量级特征的动词。面对词汇与构式的冲突,语言交际的关联原则指引着受喻者发挥其认知主体性,寻求二者相容的解读方式,从而促使构式义压制词汇义。此时,人类的转喻认知机制发挥作用:名词“绅士”指称绅士这一类人,他们具有独特的属性特征。显然,绅士和绅士所具有的属性特征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概念网络里,它们应该位于彼此相邻的节点(nodes)^④上,并且属性特征的语义与“很+X”构式对“X”的意义要求相容。因而,名词“绅士”(整体)能快速激活绅士这类人的属性特征(部分),受喻者按照属性意义来解读名词“绅士”,而其指称意义被压制。

但是,客观事物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属性特征,名词可以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概念场。在诸多属性特征构成的概念场里,受喻者是怎样快速识别出相关的属性特征的?我们认为,此过程中存在语境制约。

2.2 语境制约与语法转喻解读

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中,认知语境是客观环境和交际者的认知能力共同作用而建构的一系列假设,它不仅包含交际者所认识到的他所处客观环境里的所有事实,而且还包括他通过推理能认识到的所有事实(Sperber & Wilson 2001:39)。这是一种动态语境观,语境不是静态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现象,而是交际者利用言语交际中概念的百科知识、逻辑知识和语言知识来建构的假设,是在交际进行过程中根据现时环境及其认知能力不断动态建构的一系列有关交际环境的认知假

设。交际者根据言语交际的最佳关联原则对这些语境假设不断地选择、调整和顺应,直至最终识别出交际的真正意图。这些语境假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话语的上下文、认知背景和现时情景(Matsui 2000:120)。

上文我们谈到,在转喻的解读过程中,构式压制词汇义使得受喻者能够对“很+N”构式里的名词作转喻解读,识别其中存在类属指代属性。而具体属性的识别受认知语境的制约。

上述例(1)中,受喻者要从名词“绅士”的属性所构成的概念场中识别出名词“绅士”所转指的具体属性,其转喻推理过程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对语境假设不断选择、调整和顺应的动态过程:名词“绅士”的属性概念场包含一系列关于绅士这一类人的属性特征,如外貌、着装、行为举止、处事态度等方面,而这一系列的特征受喻者有关“绅士”这一概念的百科知识,它们构成了受喻者可及的语境假设。在此基础上,句子的上下文(即上文“决不惊慌”和下文“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和现实情景(即整个句子所传达的现实情景)作为明示信息可激活受喻者的语境假设:“绅士”这一类人处事和行为举止都很有礼貌、有风度、举止文雅,碰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失态。这一语境假设正好与例(1)里所描述的绅士的行为举止相符——“决不惊慌”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因而,有关“绅士”处事态度和行为举止相关的属性特征最终得以突显,受喻者能迅速排除其他语境假设候选项而识别出这里“绅士”转指这一类人所具有的典型特性——有礼貌、有风度、举止文雅的,从而成功解读该例中的语法转喻。但是,这个对语境假设选择的推理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认知主体多次与认知语境不断交互、动态调整的过程。再如:

(2)这个女孩穿着打扮和说话的口气很香港。(转引自张辉、卢卫中 2010:95)

专有名词“香港”指称香港这座城市。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中国的大都市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地位。与其相关的属性特征很多,可以构成一个概念场,包括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作为受喻者的认知背景知识而存在,是其认知语境假设的可及来源。面对如此众多的属性特征,受喻者首先在句子上下文——句子主语“这个女孩穿着打扮”的指引下,寻找与“穿着打扮”相关联的属性,即与时尚相关的特征。与之相关的认知背景语境假设此时会被激活,即香港是一个时尚之都,东西方时尚潮流在此交汇。因而,在句子上下文和认知背景语境的作用下,有关香港时尚属性特征的语境假设被突显。受喻者能轻松解读出与“这个女孩穿着打扮”搭配的“很香港”语义是“新潮的、前卫的、时髦的”。而句子后半部分“说话的口气很香港”里的“很香港”显然所转指的属性特征又不同。在上下文语境“说话的口气”和认知背景语境假设(即香港人说话大多带有广东话腔调)的制约

下,受喻者有关香港人说话腔调特征的假设得以突显,而其他语境假设退居为背景,受喻者很快解读出其意义是“人说话带有广东话腔调”。可见,同一语法转喻的本体,其喻体因语境的改变而不同,语境制约着转喻的创设。

由此可见,“很+N”构式里名词所具有的属性所构成的概念场为转喻推理提供了一系列可及的语境假设,但交际的关联原则和语境制约使得受喻者能从诸多的可及假设中识解转喻所转指的目标属性,从而确定名词“N”(本体)与其转指的属性(喻体)之间的转喻关系。

3. 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

从上文对“很+N”构式语法转喻解读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法转喻的解读是受喻者对意义的动态建构过程,是语言交际的关联原则、受喻者认知主体性、构式语义压制和语境等认知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具体运作过程可用图1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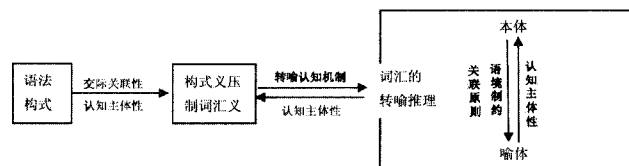


图1. 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

图1中的双向箭头表示这之间的分析推理环节是双向交互的,可能需要多次的双向互动才能确定转喻的喻体。

该模型基于构式语法、概念转喻理论和关联理论。构式语法、概念转喻理论和关联理论互为补充,可使我们探微语法转喻的解读机制,更详尽地描写和解释本体喻体概念语义通达的选择过程,从而弥补构式语法、概念转喻理论和关联理论各自对语法转喻解释的不足。首先,概念转喻理论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人们依赖本体喻体之间的邻近性来实现本体的概念语义通达喻体的概念语义,从而解读转喻。但是,转喻推理的前提是语用原则的制约——关联原则,即面对词汇义与构式义的冲突,只有受喻者视其具有关联性才会发挥主体性积极寻求词汇义与构式义相容的解读方式,进而促使其进行转喻推理。其次,构式语法里的“构式压制观”可以充分解释受喻者在语法转喻的解读过程中为什么会展开转喻推理,即构式义压制词汇义是受喻者对语法结构做转喻推理的诱因。最后,与本体概念语义具有邻近关系的概念语义通常有多个,为什么喻体的概念语义能被选中?对此概念转喻理论尚未论及。我们认为,本体喻体概念语义的通达过程中,邻近性特征的选择存在语境依赖性和语用原则的制约。如下面一则新闻标题:

(3) 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全是“诗和远方”——这很巴西!(2016年8月6日搜狐网新闻标题)

“巴西”这一专有名词本来指称巴西这个国家,但

是,在它与程度副词“很”搭配组成的语法构式里,专有名词“巴西”的指称意义与“很+X”构式的构式义冲突,此时,正是由于关联原则的制约,才使得受喻者不放弃对这一看似偏离常规的语法结构的解读,而积极发挥主体性,寻求与构式义相容的解读方式。因而,构式义压制专有名词“巴西”的指称意义,使受喻者对“巴西”的意义进行转喻推理,即构式压制是转喻推理的诱因。

而在转喻推理过程中,喻体的确定依赖语境和语用原则的制约。巴西是南美洲的一个国家,2016年奥运会在巴西首都里约举行,并且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给全世界奉上了一场独具巴西民族文化特色的文艺盛宴。这些都构成了读者解读这一新闻标题时可及的语境假设。读者在句子上下文(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全是“诗和远方”)和认知背景知识(即有关巴西这个国家的背景知识和关于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内容的知识)的共同制约下,经过选择、调整和顺应,最终确定专有名词“巴西”转指巴西这个国家所具有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典型特征。

再者,关联理论虽然阐明,在语法转喻的理解过程中,人们在语言交际最佳关联性原则的指引下,基于语境进行语用推理,建构意义,但在此间,人类基于邻近性的认知机制在意义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上述例(3)中,受喻者能够由转喻本体巴西这个国家推理至其喻体——巴西的民族文化特征,正是由于受喻者作为认知主体所具有的认知机制(人类具有由整体认知部分的能力)的作用。因此,我们提出该整合构式语法、概念转喻理论和关联理论的语法转喻解读模型,将关联原则、认知主体性、构式语义压制和语境制约结合起来,揭示语法转喻解读过程中,认知和语用因素互动建构意义的运作过程。

在该模型中,关联是前提,对于每个明示的言语交际行为,交际双方都视其具有最佳关联性。正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受喻者面对语法结构词汇义与构式义的冲突而积极发挥认知主体性,寻求二者相容的解读方式,从而使构式义压制词汇义。而此时,人类基于邻近性的转喻认知机制指引着受喻者对语法构式里的词汇做转喻推理,即构式压制是转喻推理的诱因。而在转喻推理的过程中,转喻喻体的识别依赖语境的制约,受喻者在言语交际的关联原则和认知语境的共同制约下,从与本体概念语义具有邻近关系的多个概念语义中识别出转喻喻体。此间,关联是前提,受喻者的认知主体性是主导因素,构式语义压制是转喻推理的诱因,语境制约是转喻推理的必要条件。

4. 结语

语法转喻是人类的转喻思维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探微语法转喻的解读过程有助于揭示人类认知和语用因素在语法结构理解中的作用,进而加深我们对语法本

质的认识。本文研究发现,语法转喻的解读是受喻者发挥认知主体性对意义的动态建构过程,是诸种认知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从概念转喻理论或关联理论视角来解释语法转喻的解读,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分析汉语“很+N”构式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构式语法、概念转喻理论和关联理论的语法转喻解读模型,将关联原则、认知主体性、构式语义压制和语境结合起来,揭示语法转喻解读过程中,认知和语用因素互动建构意义的运作过程。该整合模型可以为语法转喻的解读提供更充分和更有力的解释,弥补了以往研究从单一视角解释的不足。该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是基于对汉语“很+N”构式的分析而提出的,其适用性还有待心理语言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和更多的基于其他语法转喻构式(包括其他语种的语法转喻构式)的分析来验证。

* 感谢罗思明教授、冉永平教授和王中祥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 ① 本文中“受喻者”指语法转喻的解读者。
- ② “认知主体性”的核心内容是指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 ③ 这里体现了认知心理学所提出的激活扩散理论(Collins & Loftus 1975)的思想:名词“N”的概念以及“很+N”构式的构式义作为启动刺激,能很快激活目标刺激,即名词“N”所指称事物的属性特征。
- ④ Hudson(2007:1)指出,语言是一个概念网络,在该网络里,一个个概念实体彼此相连。

参考文献

- [1] Brdar, M. *Metonymy in Grammar: Towards Motivating Extensions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Constructions* [M]. Osijek: Faculty of Philosophy, 2007.
- [2] Collins, A. M. & E. F. Loftus.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5(4): 407-428.
- [3] Dirven, R. Conversion as a conceptual metonymy of event schemata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275-289.
- [4] Hudson, R. A. *Language Networks: The New Word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Kövecses, Z. & G. Radden.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8(1): 37-77.
- [6] Littlemore, J.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7] Matsui, T. *Bridging and Relevanc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 [8] Panther, K. -U.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A]. In I. F. J. Ruiz de Mendoza & M. Peña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5: 353-386.

- [9] Panther, K. -U. & L. Thornburg. Coercion and me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constructional and lexical meaning [A].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ed.).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C].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9: 37-52.
- [10] Panther, K. -U. & L. Thornburg. Introduction: On figuration in grammar [A]. In K. -U. Panther et al. (eds.).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Grammar*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1-44.
- [11] Ruiz de Mendoza, I. F. J. & J. L. Ota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Granda: Comares, 2002.
- [12] Ruize de Mendoza, I. F. J. & M. Peña. Grammatical metonymy within the action frame in English and Spanish [A]. In J. Maria De Los Angeles Gomez Gonzalez et al. (eds.). *Current Trends in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251-280.
- [13]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4] 曹燕黎. 转喻研究的学科路径、方法及其融合趋势[J]. 现代外语, 2015(2): 269-277.
- [15] 程琪龙. 转喻的认知机制和过程[J]. 外语教学, 2011(3): 1-4.
- [16] 黄洁. 副名结构转喻操作的语义压制动因[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1): 9-13.
- [17] 李勇忠. 祈使句语法构式的转喻阐释[J]. 外语教学, 2005(2): 1-5.
- [18] 李文浩, 齐沪扬. 突现、激活与转喻的实现[J]. 外语教学, 2012(4): 23-26.
- [19] 刘梅丽, 王文斌. 英语“V+up”结构的认知语义研究[J]. 外语学刊, 2016(1): 49-53.
- [20]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1] 束定芳. 隐喻研究的若干新进展[J]. 英语研究, 2017(2): 71-79.
- [22] 魏在江. 名词动用的语法转喻理据[J]. 当代修辞学, 2015(6): 37-46.
- [23] 吴淑琼. 基于汉语句法结构的语法转喻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24] 杨成虎. 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 [25] 张辉, 卢卫中. 认知转喻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8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汉施事宾语从句结构化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18NDJC307YBM)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梅丽,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服务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

责任编辑 孙毅